

1103
内部刊物
注意保存

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

第三十一期

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2001年8月20日

目 录

浙江“三忠”始末 陈伟桐

浙江“三忠”始末

陈伟桐

史料研究 1898年9月，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归于失败。结果是光绪帝被软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被迫逃往海外，“戊戌六君子”遭到杀害，变法成果付诸东流。一时间顽固势力当权，守旧思潮抬头。在帝党与后党斗争继续发展的情况下，1900年初，慈禧决定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儀为皇太子，以达到废黜光绪皇帝的目的。此举遭到各国驻华使节的抵制。至1900年春，打着“扶清灭洋”旗号的义和团由山东发展到直隶、京津一带。6月，帝国主义列强迅速集中在中国沿海的军队，直接发动镇压中国人民的侵略暴行。慈禧在这种情况下，决定借被神化为“刀枪不入”的义和团报复洋人，又借洋人来剿灭义和团。

一、冒死谏阻，庚子罹难

1900年（庚子年）6月16日，慈禧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，举行开战之议。会议一开始，主战的舆论占了上风。首先站出来反对对外作战的是浙江嘉兴人许景澄。他先后担任驻法、德、意、荷、奥、俄公使，根据多年与外国交涉的经验，他说：“中国与外洋交往已数十年，民教相仇之事，年年都有发生，然而只不过赔偿而止。惟有攻杀外国使臣，中外皆无成案。现在义和团天天窥伺外国使馆，如有不测，不知将置国家宗社百姓于何地？”许景澄的密友（浙江桐庐人）袁昶说得更慷慨激昂：“衅不可开，纵容乱民，祸至不可收拾。”立山、联元以及王文韶（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杭州人）等官员都认

为，现在各国军队云集，寡不敌众，万不能开战。可是载漪、刚毅则坚持“团民可恃”，团民有神功，能抵御洋人枪炮，凭着义和团可将洋人杀绝。对此袁昶反驳说，“臣曾微服前往东交民巷，看见不少义和团中枪倒地，可以说伏尸遍地，并不能避枪炮。”可是迷信义和团的慈禧太后却辩解道，“那是土匪，不是义和团，真的义和团是决不会中枪炮的。”

当日夜晚发生了两件事情。一是许景澄与那桐奉太后之命，赶往杨村，劝阻洋兵来北京。可是在丰台就遭到义和团拦阻，险遭不测。义和团有个规定，逮到嫌疑犯人时，要立即押至坛前，焚烧符纸（称焚香上表，以候神谕），让神来验证其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结果纸灰直起，许景澄得以生还。第二件事是，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其子深夜急呈密信于荣禄，传闻英国有四点照会，除了强索大沽炮台外，还以武力胁迫慈禧归政于光绪。这一后来查明系载漪谎报的消息，给慈禧的开战主张火上添油。

于是17日慈禧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，想强行宣战。一意主战的载漪、载勋、徐桐、崇绮、刚毅等气势甚为嚣张。光绪一听到决定对外宣战，心急如焚，正在无计可施时，抬头看到跪在下面的大臣中有长期驻外公使、多次办理对外交涉的许景澄，连忙走下御座，拉住许景澄的手，真切地对他说：“你是出过洋的，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，外间的情势你是知道的。这仗可打不可打，你可要对我讲真话。”于是许景澄含泪陈奏：“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，过去办过。至于杀使臣、烧使馆，即使在国际上亦罕见此种成案，不得不格外审慎为好。”袁昶也在边上陈述意见。光绪听后，一种悲戚的心绪涌上心头，竟然掩面哭泣起来。许、袁见了心里难受，在主战的顽固官

僚咄咄逼人的眼光之下，三人竟相对而泣起来。载漪见势不妙，大步向前，直指许、袁两人说：“请老佛爷看看，如此情形，成何体统？”随即慈禧厉声拿下，许、袁退了下去。这次会议虽然定下对外宣战的决策，但由于太后还未得到列强攻陷大沽口的消息，把开战一事暂且放下了。

事后许、袁又联名上疏《急救目前危局摺》，称早在《周礼》就明确规定治乱国必须动用重典，提出“与其外兵干预，代行剿办，……不如我自行剿办，……杜彼族之口实，以维持大局。”他们对于义和团的态度颇为复杂。一方面主张镇压；另一方面同情广大民众深受教会的欺压，埋怨地方官吏不能秉公办案，引起民教冲突。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式，尤其反对民众“自行报复”。

6月19日传来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的消息，在20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，正式决定对外宣战，并在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，“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”。由直隶总督荣禄为总指挥，董福祥率领甘军及义和团进攻各国公使馆，接着虎神营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。还在颐和园搭起高20丈的渐台，上面写着“鬼见愁”三个大字。不仅皇室大臣半数参加义和团，就连老佛爷也坚信不疑，据说是每日诵神咒70遍，念毕，下人连忙添上一句：又杀洋人一名。

此时，许景澄和袁昶又合奏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》（即第二疏）。疏中陈奏道：“伏以春秋之义，两国构兵，不戮行人。泰西公法，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，蔑视其公使，即蔑视其国。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，尽杀使臣，各国引为大耻，联合一起，致死报复。在京之洋兵有限，续来之洋兵无穷，以一国而敌各国，臣愚以谓不独胜

负攸关，实存亡攸关也。”最后他们道出了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尴尬心情，“臣亦知飞蝗蔽天，言出祸随，顾念存亡呼吸，区区蝼蚁微忱，不忍言亦不忍不言，是用冒死具奏。”

7月14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，各国还不断向中国增兵，节节进逼北京。而进攻西什库教堂一个多月，攻使馆近一月，却久攻不下，清军与义和团死伤累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景澄与袁昶于7月23日上了第三疏《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》。他们在乱党的高压下，以大无畏的精神，点名指出将国家引向灾难的诸大臣的倒行逆施、误国殃民的罪行，要求给予严惩。他们是：

大学士徐桐，素性糊涂，罔识利害；

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刚毅，比奸阿匪，顽固性成；

军机大臣、礼部尚书启秀，胶执己见，愚而自用；

军机大臣、刑部尚书赵舒翘，居心狡狴，工于逢迎。

请旨将徐桐、刚毅、启秀、赵舒翘、裕禄、毓贤、董福祥先治以重典。同时暗指载漪等肇事亲王，“盈廷惘惘，如醉如痴。亲而天潢贵胄，尊而师保枢密，大半尊奉拳匪，神而明之。甚至王公府第，闻亦设有拳坛。”

许景澄和袁昶作为反战派的主要代表，他们上奏的严劾祸首的第三疏，引起了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大臣的痛恨，必欲将许、袁置于死地而后快。而太后实际上是造成这场灾难的最大的罪魁祸首，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严劾之举。这样，第三疏就成为许、袁惨遭杀害的直接原因。

许、袁在起草此疏时，已经预感大祸之将临。此疏最后提出愿在将这些罪魁祸首置于重典之后，“诛臣等以谢徐桐、刚毅诸臣，臣

等虽死，当含笑入地，无任流涕具陈，不胜痛愤惶迫之至。”不惜以死相劾。

7月24日晨，许景澄与袁昶具陈奏折后，已作好粉身碎骨的准备，开始料理后事。据当时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回忆，午后他谒见二公，“相见款款，然两公绝不与言密疏事。”许景澄“神气惨沮”，但对于以后总理衙门的工作，慨然道：“各国联军行将入都，事不堪问矣”，“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，吾辈当豫筹抵制之策。”接着他去见袁昶，“袁公气象激昂，议论踔厉”。袁昶问起唐的起居，特邀唐文治迁入他在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居住（原为光绪老师翁同和的旧宅），到那时将与唐细谈桴亭先生（陆世仪）的学问。态度从容，大有将邸宅让与唐文治的意思。袁死后，唐写诗“流水高山今已矣，天涯何处器钟期！”知己之感，溢于言表。

7月27日，清政府秘密逮捕了许景澄与袁昶。入狱后被关在南北两个不同的牢房里。当他们在狱中分手时，袁握着许的手说：“人生百年，终有一死。死本不足惜，所不解者，吾辈究竟因何致死？”许笑着答道：“死后自然就会知道，您怎么还想不通呢？”可见袁的负气磊落，许之处世豁达。

28日下午3时，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，匆匆将许景澄、袁昶押至菜市口处决。当时的监斩官是徐桐之子徐承煜。许戴着红顶蓝翎帽，身着纱袍。执刑前徐要摘下他的官帽，许正色道：“我们虽被捕入狱，但并未奉旨解职，凭什么要褫去我们的衣冠。”说得徐脸红语塞。接着袁昶责问徐承煜：“请告诉我究竟犯下什么罪行要处于极刑，好使我们死得瞑目。”徐呵斥道，“这是什么地方，容许你如此辩解。”袁昶连忙用手指着徐承煜骂道：“国家事被你们父子败坏到这

般地步。现在我是先死了，不久洋兵进城，你们也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我们再在地下论道理。”就刑前许景澄还从容整理衣冠，向北叩头，面无怨色。事后两家都被毁，连门窗桌椅都被肆无忌惮地拆卸抢劫一空。

在处决的当日，朝廷才下正法的谕旨，罗列了许景澄和袁昶的四大罪名：“1、屡被人参奏，声名恶劣；2、平日办理洋务，各存私心；3、任意妄奏，莠言乱政；4、语多离间，有不忍言者”。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。第一条，许、袁均为清廷重臣，在官场都有极好的声誉。第二条，他们办洋务成绩卓著，与事实恰恰相反。第四条“语多离间”，指光绪皇帝与许、袁对泣一事。在御前会议的大庭广众之中，许、袁不可能对光绪再多说些什么。可是自政变以后，光绪失去与外界接触的机会，三人共泣引起了慈禧的恐惧，于是以“语多离间”来诬陷他们。看来第三条是整个案子的关键。无论从许、袁在御前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上疏的内容看，他们是因为坚决反对朝廷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，而遭到杀害的。

两周后(8月11日)，朝廷又处决了另外三位主和的大臣徐用仪、立山和联元。徐用仪(浙江海盐人)，咸丰举人。始入军机处，继入总理衙门。在甲午战争中是主要的主和派官员，因而被光绪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。待戊戌政变后复出，任总理衙门大臣和兵部尚书。徐用仪不属帝党官僚，而为后党权贵，始终受到慈禧的器重。可是在这次和战问题上力主和议，屡言不可轻与外人开衅，与慈禧意见相左，而遭杀身之祸的。徐用仪有一女婿丁某在江阴南菁书院任职。他每接岳父大人的书信，必出示于学生。一次徐用仪谈到“西兵日逼，拳匪暴横，端、刚诸人卒不悟，屡谏不从，大局可忧”。惟没有

一句谈及自己的处境。徐用仪就义前半个月给丁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：“大局难挽，余早已置身度外。余死后家中事汝料理之。”

这次被杀的立山与联元均极力劝阻围攻使馆。联元说：“即至两国失和，亦无杀害使臣之理。”立山死得更冤，载勋诬奏，立山家里有地道通西什库教堂，暗中接应，所以教堂久攻不下。被杀五人中，唯立山不在总理衙门任职，故捏造事实加害于他，被乱党诋毁为里通外国的汉奸间谍。

在徐、立、联三大臣被害的第四天(8月15日)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慈禧等仓皇西逃，义和团也随之四散瓦解，结果各国在京津长达一年的殖民占领。国亡不亡，山河破碎，君辱臣死，生灵涂炭。以后又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，仅仅赔款就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(当时我国四亿多同胞，平均每人一两白银)。

二、扶柩南下，万人瞻仰

五大臣身遭惨祸的消息传出，全国震惊，纷纷要求朝廷对冤死之大臣予以抚恤。以后清廷在列强的压力下严厉惩办肇事之王公大臣的同时，于1901年1月下诏对五大臣平反昭雪，开复原职。

在此之前两个月，杭城人民已公开对三位浙籍“通洋罪犯”进行公祭。1900年11月19日《字林西报》有以下报道：“此外尚有一节足证南省人民，不以皇太后为然者，……杭省人民祭之，其祭文挽诗，本馆亦于本日刊出。浙抚素有与洋人不恰情形，而彼处民众，竟敢公祭皇太后意中之罪人”。

在朝廷为五大臣昭雪之后，就由清末大官僚、招商总局督办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东南济急善会出面，安排浙江三大臣之亲属护送灵柩南下。离开北京时，“各使馆派兵送行，仪仗极盛。总署(即总

理各国事务衙门)诸同乡设灵路祭,有泣下者”。到了天津再搭乘轮船于4月26日抵沪,并于27日举行公祭。其壮观场面如《许文肃公年谱》所载:“公棹南下,江督以下官吏,及士大夫识与不识,皆往助执紼,祭奠成市,哀挽盈途,所谓万代瞻仰,在此一举者。”

先由济急善会在《申报》上发表公祭许景澄、徐用仪、袁昶三公的文章,接着济急善会公告祭祀日期及举丧路线,期各界周知。盛宣怀还亲启《三忠领帖布闻》。上海商人顾松泉给报馆写信说:“今东南半壁赖以安全者,无莫非三公之德惠也。”道出了上海商民为“三忠”举丧的主要原因。他还建议“按泰西通例,凡大有造于众之奇杰出殁之日,无贵无贱,各致哀思”,“敢告全埠绅商士民,当灵柩经过时,门前各设香案聊尽微忱,藉报万一。”何植园、叶勉卿、王海帆、朱葆三载文号召宁波帮商人参加路祭。

举丧的路线是由设在十六铺法租界的金利源宁波码头栈房“三公停灵所”出发,沿黄浦江边北上,折入公馆马路(即今金陵东路),往西过三茅阁桥(今延安东路河南路。延安路原系肇家浜,此为设在浜上的桥),入英租界河南路,转四马路(今福州路)达三万昌茶肆前,向北入大马路(今南京东路),转而向东经抛球场(今南京东路河南路一带),逶迤而北,由北京路西抵北泥城桥(今北京路西藏中路),再西至新闸大王庙(后来的成都北路西苏州路)登舟赴浙返乡。

重要的祭点有: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托苏松太道袁海观察于河南路奚良济药铺前;盛宣怀以下在公馆马路鸿运楼酒肆前;中外日报等报业同人祭于四马路盘记栈;铁路公司祭于江海春西菜馆;电报局在抛球场宏昌洋货号前;嘉兴旅沪诸同乡祭于丰园状元楼酒

肆前……等等，能列出具体的名称的祭点计 22 个。

其举丧队伍的规模是空前的，申报《三忠举丧记》有以下记载：“由牌次开路神、开山神，由是而大锣清道。旗尽，静回避牌、策马、执旗者四人，步行吹手一班，马上吹手一班，衔牌八对，铭旌亭三座，马上军健四名，令箭四支，蜈蚣旗四对，苏松太道亲兵、沪军营亲兵各数十名。顶马八骑□驾，全副香亭一座，诰命亭一座，马上旗牌六面，乐工一班三层，红伞一顶，刽子四名，大锣一对，□伞八顶，魂鸡亭一座，祭□三十五，□挽词六十联，像亭三座。执紼者为某学堂肄业生数十人，旅沪绅商数十人，三公亲友各数人，……孝子麻衣如雪，徒步以行，柩用龙□杠舁以二十四人。……租界巡捕持枪护送，并维持秩序。”“一路观者若堵墙，每有白衿名流、绿窗静女，下至海外梯航之侣、乡间负贩之人，莫不低首倾忱，啧啧叹忠良”。

海盐张元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受革职处分来到上海任职于南洋公学。《张元济年谱》载下他率领师生参加公祭的经过：“率公学全体师生在上海南京东路公祭浙江‘三忠’。吴稚晖建议于‘三忠’灵柩过沪时，全体师生随行执紼。先生以有荒学业而加劝阻。吴仍坚持，谓若不许，则师生全堂罢课。先生不欲过违其意，遂允之，并率队公祭。”

在挽联中人们给“三忠”以极高的评价，特录数段于后：

从容报养士深恩，为社稷宗庙土地人民不惜一死；

忠义乃史家定论，若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各有千秋。（陈宝源）

我国家厚泽深仁养士之报，为两浙名山臣浸灵气所钟。（金兆蕃）

人谓厄运终我谓中兴始，今日虞歌载路，公论大明；

足见亿兆士民同心爱国，退为吾乡哭，进为天下恸。（方瑞增）

时局已知斯，议战议和，百世下定论当衷于一；

臣心原可表，成仁成义，五人中吾乡乃得其三。（严信厚）

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叫孙瑞镜的士人，以江海善书社名义，在报上刊登广告，哀集海内挽祭诗文联额、传记汇成《劝忠录》一书，广为分送，以激励后人的爱国精神。

关于许景澄、徐用仪回乡归葬的史料不多，只知许景澄于1906年7月葬于原籍。年已86岁的著名学者俞樾撰写了墓志铭和神道碑。其墓址据1936年出版的《嘉区一瞥》所载，“在长东北七庄宇宙圩（“宇”有误，应作“字”）”。究在何处，尚须查找。徐用仪墓在海盐风景区南北湖附近，原来规模很大，“文革”期间建筑物均被毁。除墓外仅存两柱华表，据说以前有座石牌坊刻有对联：“宏济艰难臣事尽，乘机陷害圣心知”。

至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（1909年），追赐许景澄谥号文肃公，并谕赐碑文，碑文写道：“……膺历八国，以将周使四方而不辱，务持大体，为中朝力任仔肩。雅善外交，俾邻国免生窥伺。划界则鸿沟不让，文轨大同；议和则虎狼无烦，权衡悉当。升卿寺，储兹公辅之材，擢武铨曹，以股肱之任，……谥之文肃……”。此外徐用仪追谥忠愍，袁昶追谥忠节。

早在1901年三公被昭雪之后，浙省京官二十余人（包括嘉兴籍与嘉属之沈曾植、劳乃宣）联名吁请为许、袁、徐三人在原籍建祠，未获恩准。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。在宣统元年追赐三公谥号之后，浙省42名士绅联名吁请在省城西湖建立三忠祠，五月初五获得批准。吁请者大多为立宪派人士，后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

长之沈钧儒名列其中。

三、浙江“三忠”与反清之觉醒

“三忠”遭惨杀，在江浙人民中反响是强烈的，其反应不外是震惊、压抑、愤怒、离去。

震惊：在日本东京浙籍留学生创办的《浙江潮》中谈到，“自庚子之变，许、徐、袁三公受腰斩（腰斩为误传——作者）惨祸后，此辈口舌为一噤。”

压抑：原随许景澄出使俄国，以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回忆说：“征祥唯唯弗敢忘庚子之变，余尚在森都（圣彼得堡），传闻文肃遇祸，痛哭不能已，……然余心伤甚，亦不敢以文肃被祸详情叩诸人。”

愤怒：沈曾植与许景澄同乡，与袁同为京官和诗友，因而“公闻耗，悲愤不知所出”。

离去：两年前因戊戌变法失败，遭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之张元济，在1900年8、9月间，“于沪上求见李鸿章，劝其不必再为清廷效力。李斥之曰：‘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’”。在以后清廷实施“新政”中，屡邀张赴京任职，多被他谢绝。

下面说说此时陶模的表现，可集中反映浙籍士绅的思想变化。陶模，嘉兴人，曾任陕西巡抚、新疆巡抚、陕甘总督、两广总督，为清代重要疆吏。他的思想变化，在浙籍士绅中颇具代表性。他与许景澄既是同乡，又是知己。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俄边疆交涉中，许作为驻俄公使，陶作为新疆巡抚，共同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作出过贡献。他们的关系至为密切，许在给陶模的书札里称，“阁下新居近杜司空故第，敝宅则隔水为倦圃”。在许公被害一事上，陶模显然

被激怒了。三公灵柩南下，在上海公祭时，时任两广总督的陶模写的挽联的首句竟是“碧血为黄种洒”。此“黄种”是指以黄帝为祖先的汉族，所以黄种也就是汉种，意思是三公是为保卫汉族人的利益而流血的。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，实际上是以后“排满革命”的先兆。这次陶模打破了自己一贯的“满汉不分”的主张，大胆提出“三忠”为汉族人的思想，在一些人心中此举确实有些出格。难怪在《申报》中有人评论说，“嘻异己黄种二字，近日译书中偶一见之，论者已讥其不典。”接着陶模在上《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》中尖锐地指出，“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，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；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，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。”严肃批评朝廷的自私误国。

1900年6月，嘉籍王维忱、平湖敖嘉熊、海宁蒋百里，在杭州成立研究时事的政治组织“浙会”，后遭到取缔。敖嘉熊于1904年在嘉兴创办全浙第一个秘密革命机关“温台处会馆”，浙东各府志士“隐然举嘉熊为领袖”。光复会创办人之一的嘉兴龚宝铨，“自庚子联军之变即怀光复”。这些都与三忠事件有着一定联系。许、徐之死，有志之士开始与清廷决裂。敖嘉熊的表弟沈亦云为我们留下第一手材料：“义和团之乱，关心国事的人，既愤联军的凌辱，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，嘉兴人尤其敏感。……因为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的大吏许景澄、徐用仪等三人均浙江籍。徐与许是嘉兴人。许家在嘉兴城内，……有人避乱到乡，梦姜（嘉熊）全家也搬到新丰”。笔者认为，敖嘉熊走上革命道路与受此事的打击有一定联系。

四、评价与思考

在近代中国，一般说来，主战是爱国，主和是妥协投降，是误国

或者卖国。可是历史是复杂的，我们不能将“主战—爱国；主和—卖国”的表述绝对化。对于义和团运动，笔者认为，在肯定它的反帝爱国性质的同时，不能同意它盲目排外的种种做法。后来民主革命志士陈天华在《警世钟》里说道：“野蛮排外的办法，全没有规矩宗旨，忽然聚集数千百人，焚毁几座教堂，杀几个教士教民，以及游历的洋员，通商的洋商，就算能事尽了。洋兵一到，一哄走了，割地赔款，一概不管，这是野蛮排外的办法。”他在《猛回头》中又说“这义和团的心思是很好的，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，不操切实本领，靠着那邪术。……兼且不分好丑，把各国一齐都得罪了，……我们虽然恨洋人得很，也只好做应敌的兵，断不能无故挑衅，说到那围攻公使馆，烧天主堂，尤为无识。……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，把我们中国害得上不上，下不下，义和团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。”

历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，还历史本来的面目。早在20年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就中肯地指出：“至于许景澄、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，在后党淫威劫持下的当时，不计个人安危，勇敢地站出来讲话，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，他们的被杀，是个冤案。三十年来的近代史著作，对他们或者避而不谈，或者仍贬之为‘通洋’的罪犯，那不是治史的认真严肃态度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许景澄是我国清末重要的对外使节，是继第一代使节曾纪泽、郭嵩焘、薛福成、黎庶昌之后，第二代外交家的重要代表。唐文治和陆征祥都认为，“厥后使才寥落，能知外交学者，惟许文肃一人。”同时，他与袁昶等人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外交思

想财富。如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，与外国保持和局的思想；中外交涉中，不许民众“自行报复”的思想；按照国际公法，保护外国使馆与使臣的思想。当我们在抗议北约轰炸我大使馆时，我国向世界庄严承诺，我们再不会因反帝爱国出现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。读后倍感“三忠”进步思想的生命力。这是我们在百年之后再来纪念这三位爱国者的现实意义所在。

主编：徐达生

编辑：华 丽